

SINOLOGY

SINOLOGY SERIES

(津)新登字 001 号

费德林 集

赵永穆 编选

奉真 董育子 等译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河北省遵化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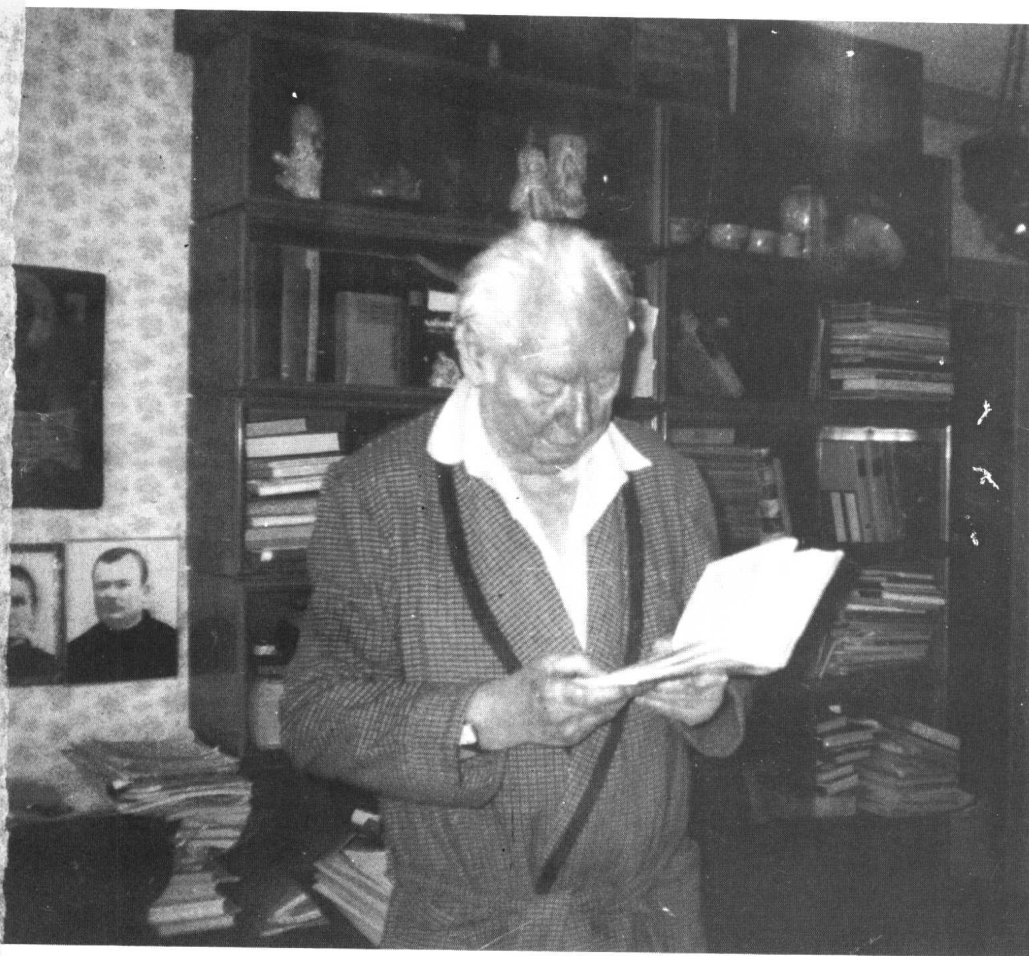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125 印张 3 插页 265 千字

1995 年 2 月第 1 版 199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201-01711-X/C · 116

定 价:13.50 元



Le. Gordon

出版献辞

列宁曾经指出：“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这点显得尤为必要。做为真正的唯物主义者，面对现代世界社会科学此起彼伏的学术思潮、层出不穷的学术成果，我们应具备在对话的基础上拿来参考、为我所用的气魄与实力。在保持敏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辨别力的同时，“占有，挑选”（鲁迅语），恰到好处地借鉴，入木三分地批评。而这一切的前提，首先在于对现代世界社会科学成果充分、准确的了解和评价。

现代世界学术著作浩如烟海，即使在某一领域内也是汗牛充栋，要想充分、准确地了解谈何容易，更遑论把握、评价了。将现代世界社会科学各领域名家大师的毕生学术成果进行筛选，择其最有代表性的著述或著述节选，结成选集出版，从而为读者充分、准确地了解现代世界主要学术成果提供一个事半功倍的途径，为对其进行总体把握和扬弃提供一个资料上的起点，这就是编辑、出版这套“现代世界社会科学名家学术”丛书的缘起。至于国外学者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因种种局限存在的谬误与不当之处，相信广大读者自会辨别、取舍，无庸多言。

本丛书所称之为“社会科学”系依国内用法，既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西方所称的“社会科学”，也包括哲学、文艺理论等西方所称的“人文科学”某些学科。

本丛书采取个人选集的形式,不出多人合集。所选收的作者应为本世纪以来各领域内公认的名家,或各领域中主要学术流派的代表人物,以及其研究课题与我国关系较大,较有参考价值的著名学者。

本丛书拟根据不同学科(如哲学、经济学、史学等)或专题(如中国研究、现代化研究等)分为若干系列,陆续推出。每系列拟出书几本至十几本不等,每本约30万字左右。

以个人选集的形式系统介绍现代世界社会科学学术成果,是一项大工程,目前国内尚不多见。这对我们是一种摸索,限于经验和水平,疏漏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衷心希望能得到国内外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帮助与指正,以在中国走向世界、积累和塑造文化的过程中尽我们的菲薄之力。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1年5月

一条屡遭遗忘的真理 (代前言)

迷恋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又是如何产生的——这是一个难解之谜，是一个如同灵感一样的谜。说到文学，则情况更是如此。

我们伟大的邻邦中国历来引起世人瞩目，而在俄国它却长期被看成是一个遥远的异邦。俄国的大学里向来喋喋不休地向学生灌输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的高度文明的概念，自然还有19世纪俄罗斯的文学名著。中国是一片几乎不为人知的偏僻之地。彼得大帝向之打开了一扇窗户的欧洲则近在咫尺，而且还有一支洋洋大观的专家队伍。

由于这一切就产生了某种以西方文明为取向。俄国人受到的薰陶声称光明来自欧洲，它赋予我们智慧，充实我们的精神。这就不能不使人忘记一条简单的真理：世界被分为西半球和东半球是有条件的，犹如人的大脑被有条件地分为左半球和右半球一样。而人类世界也和我们的头脑一样，是统一的，由于它的不可分性和整体性才得以生存。只是在这个条件下才会有和谐。

遗憾的是，我国自古以来就将目光主要投向西方。起初是注视着欧洲，后来则只看见自己的国家。而在想到东方时，又只看见神秘莫测的中华帝国的轮廓，那里的一切仿佛都已成为凝固、僵化的过去。这更助长了西欧居于优势地位的思想，助长了欧洲

中心论，后来逐渐演变成对欧洲的推崇，对欧洲的精神和物质的顶礼膜拜。

然而生活中客观地存在着文化和精神交往的全人类共同的场所。这就使我们懂得了被官方的教育政策和宣传政策掩盖起来的東西。人们在正统思想的栅栏后面看见了中國、它的文化珍品、文学名著和哲学文献。后来我们认识了這個国家，看到了它的生活的各种色彩和它独特发展过程的五光十色的各个阶段。我们知道，中國人十分清楚，每一棵树都知道它自己应当怎样生长，每一棵树的优劣都要根据它结的果实来判断。而这些果实，皇天在上，是有目共睹的。中國是远东世界的一个巨人。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当年曾经谈到过人生而具有这样的品格：伟大而坚定的目的性和渴望有所作为。这种看法的益处今天已经无需再来论证了。当初以认识中國这个十分复杂的任务为己任的人也具有这种品格。我们知道，学术上对中国的兴趣，其根源可以追溯到过去。这里闪耀着俄罗斯中國学奠基人的伟大的名字——亚金甫·比丘林、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阿历克谢耶夫，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和学生。俄罗斯东正教北京传教士团的修士司祭们立下了特殊的功绩，他们不仅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着十分清苦的生活，而且在研究中國方面取得了比科学院那些研究所更大的成绩。

我们认为自己神圣的义务就是竭尽全力使俄中两国人民的智慧和心灵接近起来。我们把消除两国间使睦邻关系蒙上阴影的隔阂视为自己的使命。我们认为通过深入的研究和相互理解就能够达到这个目的。最能培养信任感的莫过于真正意识到在面临全球的挑战和冲突时我们有共同的命运。认识到对西方和东方所有国家和人民都有利的睦邻关系的命运。

我们应当增加俄罗斯人对中国的认识,对中国的过去和今天、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文学和艺术的认识。可惜的是直到不久以前,苏联的著作像一股激流涌入中国,而中国人的书籍则只象一条涓涓细流,好不容易才挤到俄国读者面前。

我相信,中国的书籍——古代的和现代的——能够在促进更好地了解我们伟大的邻邦中国(它的土地是人道主义和全人类的精神珍品最早的摇篮)的精神生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Н Т ФЕДОРЕНКО

1992年1月,莫斯科。

目 录

一条屡遭遗忘的真理(代前言)	(1)
一 中国文学研究的问题和任务	(1)
二 研究的标准	(23)
三 中国古代和中世纪文学史的分期问题	(31)
四 文学之源——《诗经》	(55)
五 屈原的诗歌(独特性和全民性).....	(112)
六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自然哲学思想.....	(169)
七 中国古典诗人创作中自然与人的主题.....	(185)
八 古典文学与现时代——文学遗产问题.....	(204)
九 一本论述陶渊明及其诗作的新书.....	(223)
十 白居易(诞辰 1200 周年)	(230)
十一 安娜·阿赫玛托娃与中国诗歌(俄译本屈原)	(237)
十二 革命的二十年(中国二、三十年代的文学) ...	(261)
十三 作家的技巧及其诠释(纪念鲁迅诞辰九十周年)	(286)
十四 张天翼的讽刺小说.....	(303)

十五	蜀道多荆棘·····	(316)
十六	钟敬文:对真理的创造性追求(随想录) ·····	(332)
附录一	作者简介·····	(365)
附录二	主要著作目录·····	(366)
附录三	译名对照表·····	(371)

本文最初发表于1973年，
载《苏联中国学问题》。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确立，标志着以全新的方法去解决与社会思想生活和人的创造性活动有关的全部问题。历史证明，马列主义深具科学性，它对分析文学史的发展进程、艺术创作及对现实生活的审美认识都是重要的。马列主义方法论也决定着研究中国文学进程领域内的各项任务。

在中国文学史家面前摆着大量总体性和局部性的任务。其中首先是研究文学发展进程的规律，考察不同历史时期的作家的进化特点。

据此而建立起马克思主义体系的中国文学史——这就是从事文艺研究的苏联汉学家的主要任务。这一任务同样要求批判地掌握过去的科学遗产，全面研究作家与时代生活的关系，研究他们对世界的感知，并

将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机地统一起来去研究他们的创作。

此外特别重要的是,通过与其他民族各种不同的文学以及世界文学史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去展示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也就是说,必须把研究不同国家的文学所共有的普遍规律,同具体分析中国文学的民族特性结合起来。

写出一部科学的中国文学史可能并不是特别遥远的未来的任务,不过为此还必须完成各项局部的大量准备工作。

“因此,”苏联的汉学奠基人、科学院院士瓦·米·阿列克谢耶夫在《谈谈对中国“文学”的界定及文学史家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写道:“我恳请汉学家们在对中国文学史进行科学研究时能从深入阐明某一课题的专著入手。最好是选定一位很有影响的、但流传下来的作品又不太多的作家(例如陶潜),然后对这些为数不多的作品作极其精细的研究,每一步都避免出现疏漏和谬误。即使我们对产生诗人的那个时代还不大了然,即使连中国研究者也还没有向我们直接谈及的某些复杂现象目前仍未得到科学说明,但我们必须做到不从一般评论入手,而要从针对个别问题、涉及范围极为有限的科学著作——专论开始”^①。这些意见迄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根据这些论点,我们有理由,比方说,对1967年问世的列·扎·艾德林的巨著《陶渊明及其诗作》作一番分析。这部专事具体分析而非“一般评论”的极为珍贵的学术专著,无疑继承了我国汉学中文艺研究的优良传统,而且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分析中国人民的古典文学遗产的典范。

借用古代思想家庄子的话说,“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后知……”科学院院士瓦·米·阿列克谢耶夫在《苏联的汉学》一文中指出,应当把综合的汉学划分成许多

专业的现象(出现历史学家、语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艺术理论家等等)视为科学上的重要成就。作者还指出,“只因有了苏维埃的科学政策,才可能既在培养科研干部方面,又在汉学的研究本身取得极其显著的进步。”^②

的确,专业化是现代科学发展的特色,对东方语文学来说也是势所必然。

出现具有不同专业知识和特长的东方学家——这既是当前无可争议的现象,更是我国东方学领域的新现象。同样清楚的是,这种专业化现象的产生,是由科学总的发展、特别是东方学的发展所使然。无需怀疑,正是通过这些途径,我国的汉学,包括文艺学在内,将会进一步发展,并能成功地完成摆在自己面前的各种科研任务。

但说到底,我们并不认为专业化完全排斥综合的中国学。这两者绝不是对立的。汉学的研究对象过去一直是、现在仍然是某些古代文献或具体作品(即历史、哲学、民族学、文学等方面的作品)。由于古文献本身具有综合的性质,在根据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它们进行全面研究时就要求我们要有多种角度。任何象形文字的作品都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书面创作,依照历史主义的原则,应当把它放在与该时期的历史现实和社会现实的总体联系之中进行考察。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必须对它作多方面的分析,并且在书面文献内容与表现方式的有机统一之中研究它的各个方面。这就是研究古代和中世纪文艺或现代文学的中国文学史家的任务之一。

研究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学时,我们常会碰到极大的困难。首先是古文这一关,要弄懂古文就需要掌握大量的中国文学语言史的资料。另外,史料的数量极其有限,特别是能够从

中获得有关中国古代文学资料的翔实可靠的史料,比起当今对研究文学的要求来,其数量是太有限了。还有,对中国古代社会、它的意识形态,更主要是中国历史的分期等问题,目前在学术界仍旧缺乏一致的意见。

严格说来,直到 20 世纪之初,在旧中国还没有一部中国文学史——一部系统地阐述中国文学发展进程的历史。著名的中国文学史家郑振铎指出:“然而在这样一个文学之国,有这样长的文学历史,具有这么繁富的文学作品的国家之中,我们却很诧异地看出,她的文学研究绝不发达。”^③

首先是课题本质引出的问题:什么是“文学”,文学的本性或文学的构成问题?大概不会有人怀疑文学构成各不相同这一事实,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文学这一概念有过不一致的认识。这种事实同样存在于东方和西方的各种文学中,而且就其主要方面而言,是东西方文学所共有的,而不问文学的民族属性或其特性如何。此外还有一个特点:某些作品在文学发展的较早阶段上曾经进入文学之列,但后来并不总是能被收入文学之中。

由此看出,文学(文、文章、文学)这一术语的定义是同中国文学的历史根源及文学长期发展的道路联系在一起的,在它的变化中存在着辩证的规律性,换句话说,“文学”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因此对它的内涵或成分的界定也随时代而有所发展,同时,持唯心论或唯物论的各式代表人物也对此作出不同的论证。

如果对中国文学研究的遗产作一番探讨,那就会发现,旧派的语文学家对中国文学研究所得的大部分资料都具有共同的弱点,这就是在挑选和评价文学作品时缺少科学的方法论和抱有明显的主观态度。在历代中国作者的著作中,对研究对象本身——文学缺乏明确的概念和定义。评价文学时由于缺乏客观的

见解和应有的标准,常常导致研究者任意对待各种文学现象和事实,任意解释言语文字艺术的范围问题,等等。文学研究分析的方法论、研究和评论所采用的具体手段,一般都未超出那种形式主义的罗列古代文献和传统注释的框框。

在文学研究的旧史料中几乎找不到对各个时代的中国文学艺术家所塑造的形象和人物性格的分析。其中甚至也看不到有分析文字作品艺术结构的尝试,以及确定人物的世界观与社会生活、时代思想和风尚之间的关系的尝试。在中国的传统著述中,对文字艺术并没有从文学理论、美学、文学史和批评等方面综合的角度去进行研究。过去连“文学史”这一术语也没有。也没有对中国文学史作过比较一贯而完整的叙述。中国旧学者的著述中列举的不过是供创作中国文学史用的素材。而在为数不多的著述中,充其量也只是对这种或那种文学体裁的历史,或中国文学史的某些方面作过一些研究。

另一方面,20—30年代中国某些文学评论家的著述有推崇“纯文学”的倾向。例如胡云翼认为^④,文学创作是“诉之于情绪而能引起美感的作品”。胡云翼站在纯艺术的立场上,从文学概念中不仅排除了似乎与文学没有任何关系的古代文献——如经学、史学、诸子哲学以及自然科学方面的古代文献,甚至还排除了历史文集《左传》、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那些具有巨大艺术成就的文学章节。不仅如此,胡云翼还认为,用“古文”体裁写成的随笔性散文,如唐(7—10世纪)宋(10—13世纪)的文学艺术家韩愈(768—824年)、柳宗元(773—814年)、欧阳修(1007—1072年)、苏东坡(1036—1101年)等人的作品都不属于“纯文学”之列。

如此片面地对待优秀的古文献是毫无根据的。譬如,《左

传》乃是具有鲜明的形象思维特点的最早的文学作品之一。当代的中国史学家范文澜指出：“《左氏春秋传》，创文言体散文的极致”^⑤。

忽视司马迁杰出的历史文学著作《史记》同样是毫无道理的，因为其中有最优秀的艺术散文的范例，尤其是那些著名的古代人物的文学肖像。阿列克谢耶夫在评论司马迁时公正地说过：“这位中国的历史编纂学家首先是修辞大师和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奠基人（除中国历史编纂学之父孔子以外）。司马迁（公元前155—88年）还被认为是优美的叙述文学的鼻祖之一，在任何一部中国的文选中，他的作品的摘录都总是占有相当大的篇幅，中国人至今还在不断地模仿他的写作风格和方法”^⑥。瓦·米·阿列克谢耶夫以充分的理由指出：史记中最后的列传部分应被视为各朝代历史（正史）最富文学性的部分，因为这类列传犹如独立成章的文学作品，写得富有节奏感，并且通常还附有独特的总结性的赞颂之词（赞）。这些结语常常作为文学杰作的范例载入各种文选之中（如司马迁为孔子生平所写的赞词）。

许多哲学著作也不应被排斥于文学领域之外，因为这些著述或通篇，或部分，恰恰是真正的文学艺术之作。例如与古代思想家、传奇人物老子密不可分的著名文论《道德经》，就是一部以高度独创的文学风格写成的独特的叙事诗。

在20—30年代许多中国研究者的著述中还有这样一些弱点：他们研究本国的文学史时，往往局限于依照陈规旧套，形式主义地叙述作家的生平或家谱、作家的种种生活琐事、作家的亲友关系中的细微末节，但却极不重视对作家的创作进行文艺学的分析，而有关文学发展的问题，还有不同文学体裁和风格产生的渊源和原因的问题，艺术创作与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环

境的相互关系等问题则完全被置诸脑后。

这方面特别有代表性的就是郑宾于所著的《中国文学流变史》^⑦一书，书中是从不同文学体裁和风格的产生和更替的角度去看待文学创作的发展的。作者在该书的头一页上便强调说，取代古代歌谣的是散文诗的体裁——赋，接着是唐朝格律严谨的诗——律诗，其后是宋朝节奏和谐的诗——词，再就是元朝的戏剧作品——曲；在散文方面文学形式的更替情况则是：古代风格的散文、各式各样的美文学，末了是小说，即故事体散文。而且每种文学体裁又都与特定的朝代相适应，如诗的体裁的发展到唐朝为止，词是在宋朝，曲的形成是在元朝（13—14世纪）、明朝（14—17世纪）和清朝（17—20世纪），如此等等。由此可见，郑宾于把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仅仅看成是随着各朝各代统治更迭而出现的创作形式的变化，从而忽略了文学的内容、文学艺术创作的某种思想倾向及作品的社会和历史意义。

北京大学的学生们则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去阐明中国的文学发展进程，他们集体写成了《中国文学史》，1958年问世的是两卷集，1959年的修订版分为四卷。

出版前言中曾颇有抱负地强调，文学史的任务就在于正确运用马列主义的美学原理，去深入掌握丰富的历史遗产、认识文学发展的进程、揭示发展的规律、客观地评价作家及其作品在整个历史上的地位，并向人民介绍优秀的语言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文学史的作者们认为，应从历史发展远景的角度和考虑社会发展的特点及不同时期的哲学观念和美学观念的特点，去研究古代和中世纪中国作家的文学创作的艺术意义。

作者们提出的目标根本没有达到。很多论点并未得到应有的详细阐述，对文学现象的解释流于简单、粗糙，有时还欠准确，